




·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 ·



唐音浅尝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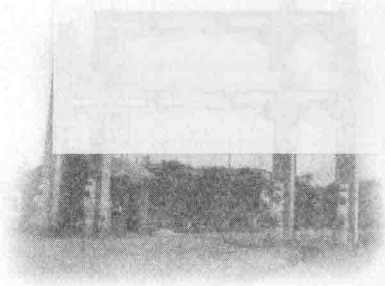
T A N G Y I N Q I A N C H A N G J I

刘学锴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 ·



唐音浅尝集

TANGYIN QIANCHANGJI

刘学锴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责任编辑:胡志恒

装帧设计:杨群 欧阳显根

责任印制:郭行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音浅尝集 / 刘学锴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2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

ISBN 978-7-5676-1174-0

I. ①唐… II. ①刘… III. ①李商隐(812~约858) - 文学研究 - 文集 IV. ①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1584号

本书由安徽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宝文基金资助出版

唐音浅尝集

刘学锴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bsfxb@126.com

印 刷: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00×1000 1/16

印 张:24.25

字 数:382千

书 号:ISBN 978-7-5676-1174-0

定 价:48.5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总 序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是1928年建立的省立安徽大学中国文学系,是安徽省高校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四个院系之一。这里人才荟萃,刘文典、郁达夫、苏雪林、周予同、潘重规、卫仲璠、宛敏灏、张涤华、祖保泉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工作过,他们高尚的师德、杰出的学术成就凝固成了我院的优良传统,培养出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各类人才。

文学院现设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秘书学、汉语国际教育等4个本科专业;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美育与审美文化研究所、艺术文化化学研究中心等5个研究所(中心)。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国语言文学、艺术学理论2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设有中国古代文学等10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和学科教学(语文)、汉语国际教育两个专业学位点;有1个安徽省A类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3个安徽省B类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现当代文学);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汉语言文学专业),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中国古代文学),2门国家级精品课程(文学理论、大学语文),1个省级刊物(《学语文》)。

文学院师资科研力量雄厚,现有专任教师82人,其中教授26人,副教授40人,博士51人。2009年以来,本学科共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74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项(含重大招标项目1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3项。教师中,有国家首届教学名师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2人,皖江学者3人,二级教授8人,5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6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走过80多年的风雨征程,目前中文学科方向齐全,拥有很多相对稳定、特色鲜明的研究领域。唐诗研究、“二陆”研究、宋辽金文学研究、词学研究、现代小说及理论批评研究、当代文学现象研究、《文心雕

龙》研究、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梵汉对音研究、句法语义接口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研究等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或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特别是李商隐研究的系列成果已成为传世经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先生说,本学科的李商隐研究,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史》的改写。

经过几代人的薪火相传,中文学科养成了严谨扎实的学术传统,培育了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打造了精诚合作的学术团队,形成了理论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扎根传统与关注当下相结合、立足本位与学科交融相结合、历代书面文献与当代口传文献并重的学科特色。

新世纪以来,随着老一辈学者相继退休,中文学科逐渐进入了新老交替的时期,如何继承、弘扬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如何开启中文学科的新篇章,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基于这一初衷,我们特编选了这套丛书,名之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计划做成开放式丛书,一直出版下去。我们认为对过去的学术成果进行阶段性归纳汇集,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可以向学界整体推介我院的学术研究,展现学术影响力。

现在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第一辑,文集作者均是资深教授或博士生导师,有年高德劭的老一辈专家,有能独当一面的中年学术骨干,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可以反映出文学院近年科研的研究特点与研究范式。

新时代,新篇章。文学院经过八十余年的风雨砥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赭塔晴岚见证了我们的发展,花津水韵预示着我们会更上层楼;“傍青冥而颀颀白日,出幽谷而翱翔碧云”。我们坚信,承载着八十多年的历史积淀,文学院的各项事业必将走向更大的辉煌!

我们拭目以待……

丁放 储泰松

2014年8月

目 录

总 序	1
几点有关古典文学研究的建议	1
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再辨正	6
李商隐与宋玉	
——兼论中国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传统	23
李义山诗与唐宋婉约词	35
李商隐的托物寓怀诗及其对古代咏物诗的发展	51
李商隐咏史诗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古代咏史诗的发展	63
古代诗歌中的人生感慨和李商隐诗的基本特征	76
分歧与融通	
——集解李义山诗的一点体会	89
樊南文的诗情诗境	98
历代李商隐研究述略	110
李商隐诗集版本系统考略	124
20世纪中国李商隐研究述略	132
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李商隐现象	149
义山七绝三题	159
李商隐诗文集中一种典型的脱误现象	
——从《为尚书渤海公举人自代状》题与文的脱节谈起	170
李商隐的七言律诗	181
李商隐开成五年九月至会昌元年正月行踪考述	
——对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的续辨正	196
李商隐梓幕期间归京考	208
从分歧走向融通	
——《锦瑟》阐释史所显示的客观趋势	218

白描胜境话玉溪	235
李商隐杂考二题	253
温庭筠文笈证暨庭筠晚年事迹考辨	263
《温庭筠诗词选》前言	275
温庭筠简谱	299
读唐诗名篇零札	323
附录:历年著述年表及著述获奖情况	372
后 记	380

几点有关古典文学研究的建议

《文艺报》编者按：丁山^①同志这篇文章所提出的几点建议很值得注意。这些建议不仅会引起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兴趣，对于近代的和当代的文学研究工作，也是有参考价值的。我们乐于把它介绍给《文艺报》的读者们。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对目前的古典文学研究有如下几条小小的建议：

一、适当地注意反面现象

在文学史中，存在着很多作为遗产来说应该排斥、批判，而作为文学史研究对象来说，却不应忽视的反面现象。优秀的文学遗产自然是我们首先应该研究、介绍的对象，但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在和落后的反动的文学作斗争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也只有在正反面文学现象的对比研究中，才能充分显示出优秀文学遗产的历史特点、历史作用，才能显示出文学史发展的规律。研究《诗经》，忽略了颂；研究楚辞，忽略了汉以来袭貌遗神的骚体赋；研究汉乐府歌辞，忽略了郊庙歌辞和汉赋；研究南北朝的山水诗，忽略了玄言和宫体……都有碍于更好地阐明优秀文学遗产的价值。文学史上的作品，都是在一定历史环境和文学环境下产生的，脱离了这点，就很难有客观的具体的评价标准。陶渊明的诗，如果不是和此前的空虚的玄言，和稍后的浮靡的宫体，和整个南朝中充斥着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诗风相对照，就很难充分估价陶渊明诗的现实意义，甚至会像某些人所作的那样，因为他没有反映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而判定他是个反现实主义诗人。陈子昂之所以杰

^① 丁山是作者发表此文时所用笔名。

出,如果不揭示南朝几百年来诗坛的积弊,如果不揭示出唐初诗坛上这种柔靡的诗风仍有相当大的影响,不指出陈子昂当时几乎是在孤军作战、登高一呼而寂无反应的情况,也就很难了解“文章道弊五百年矣”这句话的分量和他那种力图扭转颓风的雄心壮志。现在不少文学史著作中,对南朝宫体在当时笼罩诗坛,并深远地影响初唐诗坛的具体情况很少分析。如果不了解作为一代英主的唐太宗是个带头写宫体诗的诗人,不了解当时最吃香的人物是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不了解当时所推崇的李峤是怎样一个无聊的“咏物”诗的作者,不了解甚至在四杰的创作中也存在着不少宫体的影响,总之,如果不了解陈子昂是在这种情况下独树一帜,高倡风骨,不但无法估价其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就是连他诗中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深沉的孤独感也是无法理解的。“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①我们中国文学史的现象,又何尝不是如此?

要适当地研究反面现象,还因为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坏的并不一定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某些在总的方面来看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文学现象,其中也并非没有丝毫可取的地方。六朝文学,诚然是柔靡淫丽,甚至堕入恶趣,但在文学技巧方面,却积累了一些有用的经验。应该承认阶级社会中文学艺术发展的过程有这种事实:上层统治阶级是文化的垄断者,他们虽然一方面在艺术内容上反映了糜烂的生活和狭隘的阶级利益,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有文化、有时间来对艺术进行精雕细琢的人;因此就往往形成艺术内容和形式的矛盾。他们的艺术形式、技巧方面的某些收获,在我们看来有时甚至是不惜损害作品的内容而取得的。这是可悲的事实,但又不能不承认他们在这方面所作出的成绩,并看到这些成绩对后来文学的影响。

二、多研究一些规律性的现象

时常有人觉得,目前研究文章大部分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0页。

(这当然是需要的),一部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本按时代顺序编排的古代作家论集。这里,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忽略了对文学现象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作一些概括性的规律性的研究,而这,正是文学史的主要任务之一。

缺乏这种对规律性现象的研究,往往只能使读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例如,我们知道有周初的周颂,有汉初的铺张扬厉的汉赋,有晋初太康时代绮丽而缺乏社会内容的诗歌,有南朝偏安小康局面下的宫体,有唐初的宫体余波,有宋初的西昆,有明初的台阁体,有清代局面比较稳定后出现的许多脱离现实的创作理论,然而,为什么所有这些类似的文学现象都出现在一个王朝政权比较稳定的小康时期?为什么这种时期歌功颂德、粉饰现实的作品特别充斥文坛?对这样一些问题的研究,我想是可能说明一些阶级社会艺术创作的规律的。否则,我们在论述时只能作类似现象的多次重复而已。

此外,如文学史上某些体裁、题材、风格、流派、创作方法、表现手法的盛衰交替,其中也是都有线索有规律可循的。若能对这些问题展开多方面的探讨,不但给古典文学研究开辟了广大的领域,而且也直接提高了研究的学术水平,有助于更好地吸取过去的经验。

三、多注意一些特殊的文学现象

这里所指的是古典文学研究中有这种现象:用一个固定的框子去衡量一切不同时代、内容、体裁的作品。比如说,把反映阶级矛盾、表现人民疾苦作为评价古典文学的唯一标准,这样,就贬低了那些虽不合这一标准,但却仍有高度艺术价值的作品。

这里我特别要替盛唐诗歌所遭到的不公正的冷遇叫屈。我们时常提到我国古典文学的高度成就和世界意义,肯定唐诗的世界意义。但到具体评价唐诗时,却遗漏盛唐,不给它以应有的估价。因为从固定的框子出发,所以认为它没有反映阶级矛盾、人民疾苦,根本无法和中唐以来的现实主义诗歌相比。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甚至不能实事求是地去研究一下盛唐诗歌的特色,然后根据它所反映的时代对它作出应有的评价。“盛唐气象”这个反映当时诗歌特色的名词也好像无形中被取消了。然而盛唐诗歌的特色是客观存在的,它那种高昂激越的爱

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那种对生活的积极的热情的肯定,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和向往,对生活、自然界中美好事物的发掘和歌唱以及高度完美的艺术技巧,都构成了盛唐诗歌统一的特色。同时,这些又是以各种题材、体裁、风格的作品百花齐放作为基础的。它不但反映我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繁荣时代的精神和景象,并且一直到现在,那些意气风发的优美的诗歌还给我们以思想上的激励和美的享受。

对于封建社会的文学,我们不能不管社会发展阶段而对作品内容提出一律的标准。很明显,对于处在上升发展、繁荣阶段的和腐朽没落阶段的封建社会,应该区别对待。并不是在封建社会一切阶段上,都只有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才是优秀的。对于盛唐诗歌那种反映了当代生活中健康、积极、美好一面的作品,对那种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我们民族传统的审美情操的作品,为什么不能加以充分肯定呢?

对于盛唐诗歌究竟应当如何评价这个大问题,这里当然不能详谈。但我觉得,如果不从盛唐时期和盛唐诗歌的具体特点出发,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评价。

四、多注意一下目前文学创作的实际

好像无形中有这样的一种界限:古典文学研究只管客观地对作家作品进行评价,而如何批判地继承古典文学的成果、经验,则完全是创作者的事,研究者可以完全不去管它。这就形成了文学史研究和当前创作实践某些脱节的现象。自从提出厚今薄古,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学的口号和方针之后,对文学遗产的批判是加强了,但在如何使文学遗产的研究积极地为当前创作提供借鉴,如何吸取前人创作的经验成果方面,注意得还是很不够。当然,不能也不必要求每篇研究文章都联系当前创作进行如何具体借鉴的探讨,但至少应该有一部分文章担当这方面的任务。

已经有人提到探讨和总结文学史上历史剧的写作经验,对目前的历史剧创作和理论探讨提供借鉴,我很同意。这方面的路子是很广阔的。例如,近年来的诗歌创作,相对于小说、戏剧创作来说,就要薄弱一些。这里,原因和促进的办法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否也可从文学史角度来提供一些借鉴呢?诸如诗歌的题材、内容、情调、语言等问

题,都可以总结出一些有益的经验。例如,前些年关于诗歌格律问题的讨论,就是对今天创造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大有关系的课题,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是完全应该从文学史角度提出一些看法的。在体裁方面,像绝句这种短小的抒情诗曾经是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体裁,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为人民所喜闻乐见。而在目前,类似这样的抒情短诗在新诗中却不多见。如能总结和探讨一下这方面的成就和经验,对目前的诗歌创作并不是没有启发意义的。语言的精炼、典型化也是我国古典诗歌鲜明的民族特色,而目前的某些诗歌却往往忽略这方面,缺乏精炼、生动的语言和强烈的感情色彩,为什么会这样?适当地探讨这些问题,我想也是有益的。在这方面,古代的文学批评有很好的传统,他们在评论古人作品的时候,从来不只是客观地孤立地评价,而是联系当时的创作进行批评,很难分清是在评价古人还是议论今人,例如《文心雕龙》就是这样。古代许多文学史研究者同时也往往是当代文学批评家和作家。今天我们当然可以有适当的分工,但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是值得发扬的。

上述这些方面的问题之所以研究得较少,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一些具体原因外,还可能由于我们的文学史工作者、文学理论工作者、文学批评工作者把各自的工作范围划得太分明了。例如文学史只管对古代作家作品进行评论,文学理论只探讨纯粹理论性问题,文学批评只管当代作品的评价。这样太壁垒分明,就会出现一些“三不管”的研究地段,彼此都觉得这是别人的事。比如,研究文学史上一些规律性问题,文学史家可能认为是文学理论工作者的事,而文学理论工作者又认为是文学史家的事。其实这应该是由两方面通力协作的事。近一个时期,已开展的例如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与山水诗的讨论,是个良好的开端,但范围还不够广泛,希望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几个部门更好地携起手来,更多地关心一下这些“三不管”地带,这无论是对提高本门学科研究的质量,还是对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都将有很大的好处。

[原载1961年12月1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1962年第2期《文艺报》转载并加编者按]

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再辨正

清代注家冯浩和近人张采田都力主李商隐在文宗开成五年秋到翌年(即武宗会昌元年)春,有过一段历时数月的“江乡之游”。(见冯浩《玉溪生年谱》,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江乡”系摘商隐诗语,冯、张均用以特指今湖南北部洞庭湘江一带地区)。岑仲勉先生曾对此提出疑问,加以辨正[见《唐史余沈(瀋)·李商隐南游江乡辨正》及《〈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但冯、张之说仍被多数研究者视为定论。初步统计,被冯、张系于江乡之游的诗就有三十多首,加上其他被认为内容涉及此游的诗,为数更多,足见这是李商隐生平游踪考证和诗歌系年上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细审有关材料,我们发现冯浩用来坐实江乡之游的一系列“证据”,实际上没有一条能够成立。本文拟就冯浩所提出的一些主要根据加以驳正,以澄清李商隐生平游踪考证中的这一重大疑案,作为岑文之后的“再辨正”。

李商隐诗中提到“江乡”,并被冯浩引为南游江乡重要证据的,是《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

曲岸风雷罢,东亭霁日凉。新秋仍酒困,幽兴暂江乡。
摇落真何遽,交亲或未忘。一帆彭蠡月,数雁塞门霜。
俗态虽多累,仙标发近狂。声名佳句在,身世玉琴张。
万古山空碧,无人鬓免黄。骅骝忧老大,鸚鵡妒芬芳。
密竹沉虚籁,孤莲汨晚香。如何此幽胜,淹卧剧清漳?

冯浩说:“集中江乡之游,一为开成五年(840年)辞尉任南游,一为大中二年(848年)归自桂管,途经江汉……此章当属开成五年。四句‘幽兴暂江乡’,言将暂诣江乡。……‘摇落’句谓罢官,慨入官未久,已遭失意。‘交亲’句谓所亲或未忘我(按冯注本作‘或未忘’),将往依

之。‘一帆’二句，预拟江乡之程。”

冯浩对有关诗句的解释和作年的考证都是错误的。此诗作年，有一个重要而明显的内证，即“交亲或未亡”一句。而冯浩恰恰根据错误的异文把它掩盖了。“亡”字冯氏校定为“忘”，但现存绝大多数李商隐诗集较早的本子（如蒋本、姜本、悟抄、毛本、影宋抄、戊签、席本）都作“亡”，仅钱本及朱注本作“忘”。作“亡”是正确的。因为“交亲或未亡”系暗用陆机《叹逝赋序》：“余年方四十，而懿亲戚属，亡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交亲”，即陆序所谓“懿亲戚属”“昵交密友”，而“或未亡”，则正是“亡多存寡”“亦不半在”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恰巧李商隐在大中七年居梓幕时作的《梓州道兴观碑铭》中也用了同一典故：“谢文学之官之日，歧路东西；陆平原强仕（原作“壮室”，从张采田说改）之年，交亲零落。”强仕之年，即四十岁。（《礼记·曲礼上》：“四十曰强，而仕。”旧因称四十为强仕之年）。这两句正是追叙大中五年他四十岁时承柳仲郢之辟入梓幕前后的情况。这一年，他的妻子王氏病故；先前对他颇加厚遇的崔戎、令狐楚、郑亚、卢弘止等也都已相继去世。过去关系比较密切的亲友中，仅连襟韩瞻健在。此外，就是那位早就视商隐为“放利偷合”的小人而屡加排抑的现任宰相令狐绹了。这正是“交亲零落”“交亲或未亡”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由此可以断定，这首诗最早也当作于大中五年其妻王氏亡故以后。诗中一再说“身世玉琴张”“骅骝忧老大”“无人鬓免黄”，也显然是接近迟暮之年的人感慨身世的口吻，而非不到三十岁的壮年人口气（开成五年商隐二十九岁）。末句“淹卧剧清漳”，用刘桢诗：“余婴沉痾疾，窜身清漳滨”，与他在梓幕期间所作的《夜饮》（“谁能辞酩酊，淹卧剧清漳”）、《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可怜漳浦卧，愁绪乱如麻”）、《梓州罢吟寄同舍》（“漳滨多病竟无憀”）等诗语意多雷同，也可作为此诗作于商隐衰病之年的旁证。

再看冯浩对一些关键性诗句的解释。首先，把“幽兴暂江乡”解为“暂诣江乡”，无论从诗句本身或从全篇文义上看，都是缺乏根据的。诗慨叹摇落之急遽、交亲之零落、遭遇之不偶、身体之衰病，根本没有任何地方暗示将要出游。此句“暂”字与上句“仍”字对文，“仍”有重复、频繁义，“暂”有暂时、忽然义，两句盖谓新秋而重之以酒困，适对东亭曲岸、雨霁日出之清凉境界，忽似置身江乡。这是因眼前幽胜所引

发的对往日所历江乡胜景的一种联想。其次,把“一帆”二句说成是“预拟江乡之程”,也显然不妥。因为“江乡之程”即使可以预拟扬帆彭蠡,却绝不可能扯到雁飞塞门。其实,这两句紧承上文身世沉沦、交亲零落,进而概述自己平生驱驰南北、羁泊飘零的经历,是对已往生活的回顾,而非前瞻。

冯浩还举出《送千牛李将军赴阙五十韵》一诗中的“异县期回雁”之句,作为商隐开成五年南游江乡的证据。这同样是不足为据的。此诗末段说:

披豁惭深眷,睽离动素诚。蕙留春晚晚,松待岁峥嵘。
异县期回雁,登时已饭鯖。去程风刺刺,别夜漏丁丁。
庾信生多感,杨朱死有情。弦危中妇瑟,甲冷想夫箏。
会与秦楼凤,俱听汉苑莺。洛川迷曲沼,烟月两心倾。

冯笺:“异县二句,谓我将往异乡回雁峰前,今日过别,遽邀饯饮也。”按“回雁”与“饭鯖”(用五侯鯖典)相对,都是动宾结构而非名词,因此,“回雁”并非回雁峰的省语。“雁”指雁书,“期”是盼望的意思,而不是“指……以为期”的“期”。句意谓因分别而相隔异县,故望对方回寄雁书,与上“睽离”语正合。况且这首诗并非如冯氏所臆断系作于开成五年,而是作于商隐悼亡之后,姚培谦、程梦星都指出“弦危”四句系自伤失偶,这是很正确的。庾信、杨朱自喻,“生多感”,谓多时世身世之感;“死有情”,指悼亡丧妻之痛,谓王氏虽死而已则不能忘情。因此,根本不能用这首诗来证明开成末的江乡之游。

被冯氏编入“江乡之游”期间的绝大部分诗篇,连上面所引的那种不足为据的“根据”也没有,其中有的已为张氏《会笺》所驳正(如《过伊仆射旧宅》《寄成都高、苗二从事》《潭州》《岳阳楼》《楚宫(当作厉)》等),有的则根本无法证明与南游江乡有关(如《酬别令狐补阙》),或不易考定作诗年代(如《杏花》),这里不再论列辨析。张氏在冯编诸诗外,又将《燕台四首》,《代越公房妓嘲徐公主》《代贵公主》《代应二首》《鸳鸯》《河阳诗》等艳诗系于“江乡之游”期间,其穿凿附会、主观臆想,更甚于冯氏,没有必要进行辨正。

其实,冯、张之所以力主开成末江乡之游,其主要根据并不是上述

诸诗,而是李商隐赠、哭刘蕡的五首诗和《新唐书·刘蕡传》上的一段记载。冯浩《玉溪生年谱》开成五年下云:

时适杨嗣复罢相,观察湖南,因又有潭州《赠刘司户蕡》之迹^①。司户历为宣歙王质、兴元令狐楚、襄阳牛僧孺从事,皆见传文。僧孺开成四年八月出镇,会昌二年(按当作“元年”)罢,蕡在幕正当其时。蕡卒年无明文。《新书传》载昭宗诛韩全晦等,左拾遗罗衮讼蕡云:“身死异土,六十余年。”帝赠蕡左谏议大夫。是年天复三年癸亥,上距会昌四年甲子,得六十年。蕡当于开成、会昌间卒于江乡,故诗云“复作楚冤魂”,又云“湓浦书来秋雨翻”也。义山于此年至潭州。会昌元年春,与蕡黄陵晤别,而蕡于二年秋卒矣。凡此皆南游之实据也。

岑仲勉说:“罗衮之言,实为冯氏涉想之最先出发点,因而将赠蕡、潭州、哭蕡诸诗,皆集合于此两三年中。”这对冯氏南游江乡说的形成,是一语破的之论。的确,如果不细审冯氏所提出的“实据”,不细疏商隐赠、哭刘蕡诸诗,即便推翻冯氏对《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等诗所作的解释,也仍会对南游江乡说坚信不疑。许多李商隐研究者之所以信奉冯说,根本原因正在此。

问题恰恰首先出在冯氏引用的《新唐书·刘蕡传》所载罗衮疏语的可信性上。《新书传》原文是:

及昭宗诛韩全晦等,左拾遗罗衮上言:蕡当大和时,宦官始炽,因直言策请夺爵土,复扫除之役,遂罹讪逐,身死异土,六十余年。

而《全唐文》卷八二八所收罗衮《请褒赠刘蕡疏》的原文却是:

窃见故秘书郎责授柳州司户臣刘蕡,当大和年对直言策,是时宦官方炽,朝政已侵,人谁敢言!蕡独能指抑堕雨回天之势,欲

^① 杨嗣复为刘蕡座主,开成五年八(一作九)月罢相,出为湖南观察使,冯、张都断定商隐南游必至潭州嗣复幕,张氏甚至断定南游江潭系赴嗣复之招,这完全出于想当然,在商隐诗文中找不出任何根据。

使当门；夺官卿爵土之权，将令拥篲。遂遭退黜，实负冤欺。其后竟陷侵诬，终罹谴逐，沉沦绝世，六十余年。

将二者略加对照，就可明显看出：《新书传》所载“罗衮上言”并非直接引录罗疏原文，而是对罗疏的撮述，而这种撮述又是不准确的。如罗疏原文中的“遂遭退黜，实负冤欺”，系指大和二年刘蕡对策指斥宦官而被黜不第一事；“其后竟陷侵诬，终罹谴逐”，则指贬柳州司户参军。二事分叙，条理明晰。而《新书传》竟将二事用“遂罹谴逐”一语概括，仿佛刘蕡对策后即被贬逐往柳州，这显然与事实有出入。更重要的区别还在于：罗疏中“沉沦绝世，六十余年”一语，在《新书传》中变成了“身死异土，六十余年”。按“沉沦”犹沉没、沦落，通指政治上的失意沦没，《楚辞·九叹·愍命》：“或沉沦其无所达兮。或清澈其无所通。”杜甫《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奋飞超等级，容易失沉沦。”商隐《献舍人彭城公启》：“沉沦者延颈，逃散者动心。”沉沦均作沦落不遇解。这里紧承上文“终罹谴逐”，当是指其远贬柳州，沦落异乡。“绝世”方指辞世。因此，罗疏原文的意思是：刘蕡从谴逐到柳州以至于身死，到如今已六十余年。“六十余年”应从谴逐之时算起，而不是从“绝世”之日算起，这样理解，才符合一般语言习惯。《新书传》删去“沉沦”，径曰“身死异土，六十余年”，则“六十余年”当然只能从“身死”之时算起了。冯浩之所以坚信刘蕡死于会昌初年，正是由于此。

可能有人认为，刘蕡贬柳和身死异乡这二者之间或许并不存在太大的时间间隔，因而罗疏中也就统而言之曰“沉沦绝世”，而不去区分被贬之时与身死之日了。孤立地看，这样的推测不能说没有道理，而且《新唐书·刘蕡传》的作者之所以把“沉沦绝世”改成“身死异土”，恐怕正是出于这种理解（这从《新书传》“宦人深疾蕡，诬以罪，贬柳州司户参军，卒”的行文中也可看出）。但如果我们对李商隐赠、哭刘蕡诸诗细加疏解，并联系当时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对刘蕡被贬一事进行考察，就不难得出与上述理解相反的结论。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将商隐赠、哭刘蕡诸诗全部引录如下：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已断燕鸿初起势，更惊
骚客后归魂。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举自欲翻。万里相逢欢